

书 评

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

1897年莫斯科穆里诺娃书店版

全书 290 页 定价 2 卢布

(1898 年 2 月上半月)

波格丹诺夫先生的这本书是我国经济学著作中出色的作品。它不仅“不是一本多余的”入门书（象作者在序言里所“希望”的那样），而且确实是这类书中最出色的一本。因此，我们想在本文中使读者能够注意到这本书的突出的优点，同时也指出几个小问题，希望再版时最好能修改一下。读者对经济问题很感兴趣，所以我们想这本有益的书不久就会再版。

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的主要优点，在于这本书论述的问题多而且广，但是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作者一开始就给政治经济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发展中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科学”（第 3 页）。他在这本书中一直没有离开这个观点。但是博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对这个观点却往往了解得很差，他们往往离开“社会生产关系”而去谈论一般的生产，把一大堆内容空洞、与社会科学毫无关系的陈词滥调和例证塞满了自己厚厚的教程。编教科书的人往往陷于烦琐 在下“定义”和分析每个定义各个特点时精雕细刻，《教程》

的作者却没有这个通病，这不但没有影响该书论述的清晰，反而使它显得非常得体，例如，读者从本书中可以明确地了解资本这一范畴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按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生产结构的科学，这个观点就是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在阐述这一科学时所采取的程序的基础。作者在开头简略地阐述了这门科学的“一般概念”(第 1—19 页)在结尾简略地阐述了“经济思想史”(第 235—290 页)在《三 经济发展的过程》这一篇中，叙述了这门科学的内容。叙述不是教条式的(如大多数教科书那样)，而是按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依次叙述，也就是依次叙述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最后是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正应该这样来叙述。也许有人会反对说：这样一来，作者势必把同一理论问题(譬如货币)分在各个不同时期来叙述，因而难免重复。但是按历史时期叙述的主要优点，完全能弥补这个纯粹形式上的缺点。再说这能算一个缺点吗？重复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对初学者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会使初学者更牢固地掌握特别重要的原理。例如，把货币的各种不同职能放在经济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来叙述，就向学习的人清楚地说明，对这些职能的理论分析，不是根据抽象的思辨，而是根据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的精确研究。这样，对历史上特定的各个社会经济结构所得的概念，就比较完整。要知道，政治经济学入门书的全部任务，是要使研究这门科学的人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每一种制度的根本特点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是要使领会这本初级入门书的人得到可靠的线索，以便进一步研究这门学科，是要使他懂得现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都同经济学问题有最直接的关系，从而对这种研究发生兴趣。百分之九十九的政治经济学入门

书，正好没有做到这一点。它们的缺点，主要不在于通常只谈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而在于它们不会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制度的根本特点上去；不会清楚地确定这个制度的历史意义，指出这个制度的产生过程（和条件）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不会把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各种现象看成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看成是这个制度的根本特点的表现；不会给读者可靠的指导，因为它们的思想通常不能贯串始终；最后，它们不会启发学习的人的兴趣，因为它们非常狭隘和缺乏联系地去理解各个经济问题的意义，把经济、政治、道德等等“因素”“诗意般地混杂”在一起。只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澄清这种混乱，才能广泛地、有条理地、精明地观察社会经济的特定结构，把它看作人类整个社会生活特定结构的基础。

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的突出优点，正在于作者始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说明某一个经济发展时期的时候，通常总是结合该经济制度的根本特点，来“叙述”政治制度、家庭关系和社会思想的主要派别。作者在阐明了某一经济制度怎样产生一定的社会阶级划分之后，就说明这些阶级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家庭、精神生活各方面的表现，说明这些阶级的利益怎样反映在一定的经济学派中，例如主张自由竞争的学派就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庸俗经济学派（第 284 页）即辩护学派，则反映了晚期资产阶级的利益。作者十分公正地指出历史学派¹（第 284 页）和讲坛改良主义学派即“现实主义学派”或“历史伦理学派”）同一定的阶级地位之间的联系，而讲坛改良主义学派应该认为是“折中学派”（第 287 页），它空洞地和虚伪地认为法律政治制度等等的来源和作用是“超阶级的”（第 288 页）。作者也把

西斯蒙第和蒲鲁东的学说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论据充足地把他们列为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指出他们的思想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中间过渡地位”（第 279 页）的特定阶级的利益，毫不隐讳地认定这类思想有反动作用（第 280—281 页）。由于作者的观点一贯，并且善于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同相应的经济制度的基本特点联系起来观察，因此，他正确地评价了工人分沾企业利润和生产合作社这类现象的意义，说明工人分沾企业利润是一种“对企业主很少会有利的工资形式”（第 132—133 页），而“在资本主义关系中组织起来的”生产合作社，“实质上只能扩大小资产阶级”（第 187 页）。

我们知道正是波格丹诺夫先生《教程》中的这些特点会引起不少的非难。不言而喻，俄国“伦理社会学”学派²的代表人物和拥护者是一定会不满的。那些认为“经济史观问题纯粹是学院式的问题”的人，以及许多别的人也一定要不满的……但是，除了这种可以说是由于党派原因造成的不满以外，大概还有人会指出说提出的问题过于广泛使《简明教程》过于简略在 290 页的篇幅中，竟叙述了从氏族公社和原始人起到资本主义卡特尔和托拉斯止的所有经济发展时期，叙述了古代和中世纪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以及经济思想史。的确，亚·波格丹诺夫先生的阐述是极为扼要的，他自己在序言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并且干脆把自己的书称为《大纲》。毫无疑问，作者某些提纲式的评论（大部分涉及历史事实，有的涉及比较具体的理论经济问题），对希望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初学者来说，是难于理解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不能责怪作

《俄国思想》³（1897 年 11 月，书刊评介栏 第 517 页）的评论家就是这样想的。
天下就有这样的小丑！

者。我们不怕别人指责我们发表谬论，我们要说，书中有这类评论不是缺点，而是这本书的优点。的确，要是作者果真对每一个评论都加以详细叙述、阐明和论证，书的篇幅就会扩大到无边无际，这是和简明入门书的宗旨完全不相符的。而且，无论哪一种教程，甚至最厚的教程，要把现代科学关于所有经济发展时期的全部材料和从亚里士多德起到瓦格纳止的经济思想史的全部材料叙述出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作者舍去所有这些评论，那就缩小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意义，他这本书也就绝对算不上一本好书了。我们认为，现有的这些提纲式的评论，会使教这本大纲和学这本大纲的人都得到很大的益处。教的人得到的益处自不必说。学的人则可以从这些评论的总和中看到，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随随便便^①。不能没有任何基础知识，不能不了解很多极重要的历史问题、统计学问题及其他问题。学的人可以看到，有些教科书和教程往往“叙述得‘非常’浅显”，但是内容非常空洞，废话连篇，读了一本，甚至几本这样的书，也不能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学的人还可以看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最紧要的问题，都是同经济问题密切联系着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所有入门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提供各该学科的基本概念，指出深入研究该学科的方向，说明这种研究为什么是重要的。

现在谈谈我们的第二部分意见，指出波格丹诺夫先生的书中某些我们认为需要修改或补充的地方。我们希望可敬的作者不会因为这些意见琐碎甚至近乎挑剔而抱怨我们，因为大纲中的个别句子甚至个别字眼，比详细阐述中的重要得多。

正如考茨基在他有名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的序言中所明确指出的。

一般说来，波格丹诺夫先生使用的是他所属的那个经济学派的术语。但是，谈到价值形式时，他却用了“交换公式”（第 39 页及以下各页）这个说法。我们觉得这个说法不妥当。在简明入门书中使用“价值形式”这一术语的确不太恰当，似乎用交换形式或交换的发展阶段较好，否则，连“第二种交换公式的优势”（第 43 页）（？）这种说法也出现了。谈到资本时，作者毫无理由地忽略了资本总公式，而这个公式是能帮助学的人领会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共同性的。在说明资本主义时，作者略去了工商业人口比农业人口相对增加的问题和人口集中到大城市中的问题。使这个缺点更加显得突出的是，作者在谈到中世纪时，详细地叙述了城乡关系（第 63—66 页），而谈到现代城市问题时，对城市支配乡村的问题（第 174 页）却一笔带过。谈到工业史时，作者非常武断地把“家庭手工制资本主义生产”^①放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之间”（第 156 页第 6 条）。我们觉得，这样简单化地处理这个问题是不完全妥当的。《资本论》的作者把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放在机器工业这一章中去叙述，直接把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归结为机器工业对旧劳动形式实行改造的结果。事实上，这种家庭劳动形式，例如盛行于欧洲和俄国成农业中的家庭劳动形式，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之间”。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家庭劳动形式的出现是在工场手工业以后，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应该谈一谈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时期^②这一章中的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

第 93、95、147、156 页。我们认为作者恰当地用这一术语代替了由科尔萨克引用到我国书刊中来的“家庭手工制大生产”一语

② 把资本主义严格地划分为工场手工业时期和机器生产时期，是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的一大优点。

是没有专门一节来叙述后备军和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问题，来说明人口过剩如何因机器工业的出现而产生，在工业的周期性运动中起什么作用和有什么主要表现形式。作者在第 205 页和第 270 页上对这些现象一笔带过，这无疑是很不够的。作者肯定地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利润的增长比地租快得多（第 179 页）这样说是太大胆了。不仅李嘉图（波格丹诺夫先生的这个见解正是反对李嘉图的），而且马克思也确认，总的趋势是，在任何条件下地租的增长都是特别迅速的（甚至在粮价下跌的时候，地租也可能增长）。最近期间，在美洲、澳洲等处女地的竞争下引起的粮价急剧下跌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地租下跌现象），只是从 70 年代才开始的，而恩格斯在地租这一篇中对现代农业危机作的注释（《资本论》第 3 卷第 2 部分第 259—260 页^①），说得慎重得多。恩格斯确认各文明国家中有地租增长“规律”，这说明“大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可惊的生命力”，接着他又指出，这种生命力“会逐渐枯竭”（allmählich sich erschöpft）。关于农业的那几节，也显得过于简略。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地租一节中，只用寥寥数语指出资本主义农业是地租存在的条件（“在资本主义时期，土地仍然是私有财产起着资本的作用”（第 127 页），——只有这么一句！）为了避免任何误解起见，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农村资产阶级的产生、农业工人的状况以及这种状况与工厂工人状况的区别（需求和生活水平较低；还有农民受土地或各种规定地主和农奴相互关系的条例约束的残余等等）。作者没有涉及资本主义地租产生的问题，也很遗憾。他谈完了隶农⁴、依附农民和我国农民的租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817—818 页。——编者注

地以后，应该简略地讲一讲地租的总的发展进程，从工役地租（Arbeitsrente）到实物地租（Produktenrente），再到货币地租（Geldrente），最后到资本主义地租（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47章^①）。在谈到资本主义排挤农民的副业而使农民经济丧失了稳固性的时候，作者说：“农民经济总的来说变得愈益贫困，它所生产的价值总额日渐减少。”（第148页）这是很不确切的。资本主义使农民破产的过程，是农民本身产生的农村资产阶级排挤农民的过程。比如说，波格丹诺夫先生如果不涉及拥有整块（不分散的）土地的农民，恐怕未必能论述德国农民经济的衰落。上面作者谈的是全体农民，接着举了俄国生活中的例子，但是谈论“全体”俄国农民是很冒险的。作者就在这一页上写道：“农民或者只经营农业，或者到手工工场去做工”就是说（让我们补充一句）或者是变成农村资产者，或者是变成无产者（拥有一小块土地）。这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都应该谈到。最后，我们必须指出，该书总的缺点是缺乏俄国生活中的例子。在许许多多问题上（例如中世纪的生产组织、机器生产和铁路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长、危机和辛迪加、手工工场和工厂的区别等等问题），从我国经济学著作中举出这样的例子，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对初学的人来说，由于缺少他们所熟悉的例子，就很难领会这门学科。我们认为，弥补上述缺陷，仅仅会使该书的篇幅略有增加，而不会影响该书的广泛传播。从各方面说来，我们都十分希望该书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

载于 1898 年 4 月《世间》杂志
第 4 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4 卷第 35—43 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881—917 页。——编者注

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

（卡雷舍夫教授在统计学方面的新功绩）⁵

（1898 年 8 月下旬）

俄国广大读者对我国工厂统计及从中得出的最主要结论都感到极大的兴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问题是同“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样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联系着的。可是，很遗憾，我国工厂统计的编制工作根本不能适应大家对这种资料的普遍需要。我国这一经济统计部门的现状，实在令人痛心；恐怕更令人痛心的是，编写经济统计的人对自己所整理的数字性质如何，这些数字对于作出某些结论是否可靠和是否有用，往往无知得惊人。对于卡雷舍夫先生的近作正好应该作这样的评论。卡雷舍夫先生这一著作先在《莫斯科农学院通报》（第 4 年卷第 1 册）上发表，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用了一个堂而皇之的书名：《俄国国民经济资料。（一）90 年代中期的我国工厂工业》（1898 年莫斯科版）。卡雷舍夫先生试图在他的著作中根据工商业司的最新出版物^①作出关于我国工厂工业的结论。我们打算详细分析一下卡雷舍夫先生的结论，特别是他所采用的方法。我们认为，这种分析的作用不仅在于确定某某教授先生是怎样整理材料的（谈这个问题，只要写几

《工厂索引。俄国工厂工业。财政部工商业司编》1897 年圣彼得堡版。导言 63 页 + 序言 VI 页 + 正文 1047 页。

行评语就够了），而且在于确定我国工厂统计资料的可靠程度，这些资料对于哪些结论有用，对于哪些结论没有用，我国工厂统计最主要的需要是什么，以及研究工厂统计的人的任务是什么。

从这个书名可以看出，卡雷舍夫先生利用的资料来源有 1894—1895 年度的帝国工厂索引。出版所有工厂（即比较大的工业企业，至于哪些企业算大的，有各种不同的理解）的完整的表册，在我国著作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奥尔洛夫先生和布达戈夫先生从 1881 年起就在编制《工厂一览表》该书最近一版（第 3 版）于 1894 年出版。更早以前，远在 1869 年《财政部年鉴》第 1 编工业统计公报的附注中就已经刊印了工厂一览表。所有这些书的材料来源，是各厂主依法每年应向财政部呈报的报表。工商业司的新书与这类旧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资料较多，但是也有旧书所没有的重大缺点，所以把它作为工厂统计材料来加以利用就极感困难。《索引》的序言恰巧指出了过去这种统计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从而明确指出这一本书的目的，不仅能当参考书用，而且能当统计材料用。但是作为一本统计书来讲，《索引》的缺陷却在于根本没有任何归纳的总计数字。但愿这本没有总计数字的统计书是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至于对一本参考书来说，由数字堆砌成的大量原始材料则是一堆赘物。《索引》的序言尖锐地批评了以前厂主向财政部呈报的报表，指出这些报表“年年重复那些混乱的材料，使人甚至不能明确地得出产品的数量。然而，有关生产的尽可能完整而可靠的资料却是迫切需要的”（第 1 页）。当然，我们决不会替已经完全过时的、在结构上和性质上纯属改革以前的我国工厂的旧统计制度辩护。但是，很遗憾，工厂统计状况至今几乎仍无任何改进。根据刚刚出版的这一大本《索引》，我们还不能说，这个

一致公认的毫不中用的旧制度有了什么重大改变。报表“使人甚至不能明确地得出产品的数量……”的确，最新的《索引》也完全没有提供关于商品数量的任何材料，但是，奥尔洛夫先生的《一览表》却提供了许多工厂的这种材料，对于某些生产部门甚至提供了几乎全部工厂的这种材料，因此，在总计统计表中也就有了产品数量的材料（制革业、酿酒业、制砖业、碾米业、面粉业、制蜡业、油脂业、制麻业、啤酒业）。而《一览表》的材料恰巧是根据这些旧的报表编制的。《索引》中没有任何关于使用机器的统计材料，而《一览表》却提供了某些生产部门的这类材料。《序言》这样描述了我国工厂统计中所发生的变化：从前厂主“按照简单而不够明确的纲要”通过警察局呈报材料，而又不经任何人的审核。“材料是有了，但根据这些材料作不出任何比较确切的结论。”（第1页）现在，制定了详尽得多的新纲要，而工厂统计材料的收集和审核已由工厂视察员来负责了。初看起来现在我们一定会有真正象样的资料了，因为纲要正确，审核资料有保证，这两个搞好统计的最重要的条件已经具备。但是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直到现在仍然象以前一样混乱不堪。尽管从统计方法学来说要求把收集资料所遵循的纲要加以公布，然而在《索引》的《序言》中我们却看不到附有说明的详细纲要。从下面对于《索引》的材料所作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工厂统计的一些基本的纲要问题仍旧模糊不清。至于材料审核的问题，请看赫尔松省实际做审核工作的工厂视察长米库林先生的评论（他出过一本书，该书整理了按照新的制度收集的赫尔松省的材料）

“要把工业企业主所呈报的报表中的全部数字材料核实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和其他同类企业的材料，或者和视察企业时所得

到的资料进行比较，发现答案显然不一致的时候，才会将这些报表退回订正。总之，每一企业登记在表册上的数字材料是否准确都由呈报人负责。⁶《赫尔松省工厂工业和手工工业》1897 年敖德萨版，序言。黑体是我们用的）由此可见，材料的准确性仍由厂主本人负责。工厂的视察人员不仅不可能审核全部材料，甚至保证不了材料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

《索引》及其材料的全部缺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列举出来。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它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完全没有总计数字（而私人编制的《一览表》却有总计数字，并且每出一版都有增补）。卡雷舍夫先生在另外两人的帮助下产生了一个良好的心愿，希望哪怕是部分地弥补一下这个缺陷，根据《索引》计算出我国工厂工业的总计数字。这是一件很有益处的事情，假使……假使卡雷舍夫先生首先把他所算出的哪怕是某些总计数字全部列举出来，其次，假使他能毫不客气地以批判态度来对待资料，那大家就会感激他办到了这件好事。但是，卡雷舍夫先生对资料漫不经心，也没有在统计上加以比较^① 仔细的“整理”就匆忙地作了“结论”从而很自然地犯了一系列极其可笑错误。

我们先从工业统计的第一个问题，即基本问题谈起：究竟哪些企业应该算作“工厂”？卡雷舍夫先生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想必以为“工厂”是一种早就明确的东西。他在谈到《索引》时，用一种勇敢得不得了的口吻断定，这本书与以前的书不同，它不只是登记大工厂，而是把所有的工厂都登记了。这种被作者重复了两

与《俄罗斯新闻》⁶（1898 年第 144 号）评论家的意见相反。看来，这位评论家没有能力批评卡雷舍夫先生的结论。就象卡雷舍夫先生没有能力批评《索引》的数字一样。

次第 23 页和第 34 页) 的论断根本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恰恰相反, 《索引》和过去工厂统计方面的书比起来, 只是登记了一些比较大的企业。现在让我们来说明一下卡雷舍夫先生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不过不妨先举出一个史实。在 80 年代前半期, 我国工厂统计根本没有任何定义和条例把工厂的概念限定为比较大的工业企业。“工厂”统计包括各种各样的工业企业(和手工业企业), 这自然在统计资料中造成极大的混乱, 因为靠当时的人力和方法(就是说没有正确的工业调查)把所有这些企业全部登记下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有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把成百成千最小的企业计算在内, 而另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则只是把比较大的“工厂”计算在内。因此, 很自然, 60 年代首批试图科学地整理我国工厂统计资料的人员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并且竭尽全力把多少具有可靠统计资料的生产部门同根本没有可靠统计资料的生产部门分开, 把一些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统计资料的大企业同一些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统计资料的小企业分开。布申、博克^②和季米里亚捷夫^③曾经就所有这些问题作了非常宝贵的示范, 如果编制我国工厂统计资料的人员严格遵循这些示范, 并且加以发展, 我们现在也许会有很象样的统计资料。然而, 实际上人们对于这些示范置若罔闻, 工厂统计依然混乱如昔。从 1889 年起工商业司开始出版《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1885 年和以后各年) 这本书前进了一小步, 它没有把生产总额不足 1 000 卢布的小企

《财政部年鉴》1869 年圣彼得堡版第 1 编。

② 《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1872 年圣彼得堡版第 2 部第 6 编。欧俄工厂工业统计材料由伊·博克主编。

《欧俄工厂工业主要部门统计图表(附厂名清册)》1869 年、1870 年和 1873 年圣彼得堡版。共 3 编。

业计算在内。显然，这个标准还是太低，太不精确，因为要想通过警察局收集材料，把生产总额超过 1 000 卢布的全部工业企业完全登记下来是可笑的。仍旧象从前一样，有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把生产总额在 2 000—5 000 卢布的大量小企业统计在内，而另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却把它们略去不计。我们在下面将举出这样的例子。最后，我国新的工厂统计制度采用了完全是另一种标志来确定“工厂”的概念。“拥有工人不少于 15 人或工人虽不足 15 人，但有蒸汽锅炉、蒸汽机或其他动力机械和机器，或者有工厂设施的“所有工业企业”^①（受工厂视察机关“管理”的企业）都应该登记。我们应该详细谈一谈这个定义（我们已经用黑体标出了这个定义中特别模糊的地方），但是我们首先要指出，这里确定的“工厂”概念，在我国工厂统计中完全是一种新的提法，因为在这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试图以一定数量的工人或者有蒸汽发动机等等设备的企业来确定“工厂”的概念。一般地讲，严格限定“工厂”这一概念是绝对必要的，但遗憾的是现在引用的这个定义非常不确切，非常模糊。这个定义指出了“工厂”统计应该予以登记的企业的下列标志：（1）企业受工厂视察机关的管辖。看来国家所属的企业和其他企业以及采矿厂等是不在此例的。但是《索引》把很多国家的和政府的工厂也都统计在内（见字母顺序表册第 1—2 页）我们不知道，是否所有省份的这些工厂都登记了，是否有关这些工厂的资料都经过工厂视察机关的审核等等。总之，必须指出，在我国工厂

科别利亚茨基 1895 年 6 月 7 日的通告（《工厂视察机关官员……手册》1897 年圣彼得堡第 4 版第 35 页 黑体是我们用的）在《索引》的《序言》中并没有转载这个通告，卡雷舍夫先生在整理《索引》中的材料时并不想弄清楚《索引》对“工厂”这一名词的理解！！

统计还没有摆脱管辖各种不同工业企业的各种不同“主管机关”的束缚以前，工厂统计是不可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各主管机关的管辖范围不清，时常变动，即使各主管机关采取同一纲要，其做法也始终会各不相同。要把这件工作安排得合理，所有工业企业的全部资料必须由一个严格遵守用同一方法收集和整理材料的纯粹统计机关集中掌握。在还没有这样做以前，就必须非常慎重地对待包括或者不包括（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省份）“其他主管机关”所属企业在内的工厂统计材料。例如，我国工厂统计早就不把采矿厂包括在内了，而奥尔洛夫却在新出版的《一览表》中把不少采矿厂（几乎全部钢轨生产，维亚特卡省伊热夫斯克工厂和沃特金斯克工厂等）计算在内，《索引》没有计算这些采矿厂，但是它把其他一些省份的“工厂”统计从前不计算在内的采矿厂（例如伊丽莎白波尔省的西门子炼铜厂 第 330 页 登记下来了。《索引》的《序言》在第 8 部分指出了制铁、熔铁、铸铁和铸铜等生产部门（第 III 页），但是根本没有指出怎样把采矿厂和工商业司“所辖的”工厂区分开来。

（2）应该登记的只是工业企业。这个标志其实并不是一看就那么明显，因为要把手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分开，就要编制适合于每一生产部门的详尽的条例。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很多由于缺乏这种条例而引起混乱的例子。（3）企业中的工人应不少于 15 人。是只计算企业内的工人，还是连企业外的工人也计算在内，这一点不清楚；怎样区分这两种工人（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是否应计算辅助工人等等问题也没有讲清楚。米库林先生在上面提到的书中举出了由于没搞清楚这些问题而产生混乱的例子。《索引》举出了不少只有厂外工人的企业。显然，靠现行收集材料的制度，企图把所有这类企业（即所有分配活计的商店和所谓的手工业中的订

货人等等)都包罗在内,只能使人发笑,而有关某些省份和某些生产部门的零星材料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只会造成混乱。(4)凡是有蒸汽锅炉或蒸汽机的企业都算作“工厂”。这个标志最确切,选得也最恰当,因为蒸汽的运用的确是大机器工业发展的标志。(5)凡是有“其他的”(非蒸汽的)“动力机械”设备的企业都算作“工厂”。这个标志非常不确切,也太广泛,根据这个标志,凡是有水力、马力、风力、甚至脚踏动力设备的企业都可以算作工厂。既然根本办不到把所有这类企业全部登记下来,混乱也就势在难免,下面就有这方面的例子。(6)凡是有“工厂设施”的都算作“工厂”。最后这个绝对不确切而且模糊不清的标志,使前面那些标志失去意义,并使统计材料必然混乱和无法比较。在不同的省份对于这个定义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解,而且这能称之为定义吗?凡是有工厂设施的企业都称为工厂……这就是我国新的工厂统计制度的最新发现。这种统计非常不能令人满意,是不足为奇的。现在我们从《索引》的各个部分中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个别省份和个别生产部门是怎样把那些会给工厂统计造成混乱的最小企业登记下来的,因为把所有这一类企业一一列举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来看看第1部分“棉花加工”。在第10—11页上看到弗拉基米尔省农村里有5个“工厂”靠替别人染棉纱和麻布挣钱(原文如此!)。这里没有生产总额,而只是指出了染费收入由10(?)—600卢布,工人人数是0(不知道这是指没有工人人数的资料呢,还是指没有雇佣工人)—3人。没有任何发动机。这是农民染坊,是最简陋的手工业企业,一个省偶然把这类企业登记了,其他省份显然把它们略去了。在第2部分(羊毛加工),我们在同一个弗拉基米尔省发现一些手工“工厂”,专门替别人弹羊毛,每年收入12—48

卢布,有工人 0—1 名。在第 3 部分(第 2517 号)有一个农村手工丝织厂,有工人 3 名,生产额 660 卢布。在第 4 部分(亚麻加工)第 141 页上,又是那个弗拉基米尔省有一些农村手工染坊,有工人 0—3 名,麻布加工收入是 150—550 卢布。第 5 部分,在彼尔姆省有 1 个手工编席“工厂”,工人 6 名,生产额 921 卢布(第 3936 号)。在其他省份(例如科斯特罗马省)这类企业当然也不少,但是没有算作工厂。第 6 部分有 1 个印刷厂,工人 1 名,生产额 300 卢布(第 4167 号);其他一些省份只统计了大印刷厂,还有一些省份则根本没有统计印刷厂。第 7 部分有 1 个锯木“工厂”,工人 3 名,木板加工收入 100 卢布(第 6274 号)。在第 8 部分有 1 个手工五金加工工厂,工人 3 名,生产额 575 卢布(第 8962 号)。在第 9 部分(矿产品加工)有很多极小的企业,特别是制砖厂,例如有的只有工人 1 名,生产额 48—50 卢布等等。在第 10 部分(畜产品加工)有一些小型制蜡、羊皮和制革等手工业企业,工人 0—1—2 名,生产额数百卢布(第 489、507 页及其他各页)。但是在第 11 部分(食品加工),在榨油业中,特别是面粉业中,纯手工业式的小企业最多。在面粉业中把“工厂”同小企业严格区别开来是特别重要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做,我国所有的工厂统计方面的出版物都混乱不堪。各省统计委员会秘书第一次代表大会(1870 年 5 月)^①曾试图整顿面粉业工厂的统计,但是枉然,在这以后编制我国工厂统计的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所发表的统计材料毫不中用。例如《索引》把只有 1 名工人、收入 0—52 卢布(第 587、589

根据代表大会拟定的关于收集工业资料的条例草案,所有不足 10 盘磨、不出产上等面粉的磨坊都不算在工厂之内。《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第 2 部第 6 编序言第 XIII 页。